

京师学术随笔



思想的苇草

历史与人生的叩问

何兆武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
师
学
术
随
笔



思想的苇草

历史与人生的叩问

何兆武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苇草: 历史与人生的叩问 / 何兆武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
(京师学术随笔)
ISBN 978-7-303-15797-6

I. ①思… II. ①何…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2997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SIXIANG DE WEICAO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5 mm × 235 mm
印 张: 1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策划编辑: 饶 涛	责任编辑: 曾忆梦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耿中虎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前 言

十年以前,我曾经应三联书店之邀,把过去一些零星的文字集为一个小册子,题为《苇草集》出版。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又邀我再把近几年的短文集为一个小册子。因为自己生性疏懒,每每事过之后,无论刊登与否,就随手弃掷,从没有过完整保留下来的习惯,所以,这次也是将一些能寻觅到的旧作收集整理成一本小书,遂题名为《思想的苇草:历史与人生的叩问》。

本书所收文字大多是一时的随笔,并非什么长期积累的成熟结论。事后自己再次看过也每每觉得难以为情。有时候,就以如下的想法聊以自嘲:人的思想总是由零零碎碎的感触长期积累而逐步形成的,没有夹生的,自然也就不会有成熟的。所以,这一点也可以成为不成熟的思想也应该容许其存在的理由吧。

一切成熟的东西总是从不成熟的状态之中

生长出来的。思想总是不断在变化、在更新的，任何思想都不可能是一旦出现就成为永世不变的定论。一切思想理论都是在初级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的。伟大的人物如马克思，其思想是在19世纪下半叶定型的，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了。假如他仍然活在今天，他会全盘认同自己一个多世纪之前的那些思想和论点，而一点都不加以改变吗？我们每个人老年时的思想和自己青年时会全然一样吗？历史是不断在演变着的，历史上所形成的任何思想也都是在不断演变着的。世界上没有永世不变的金科玉律。或者说，世上唯一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就只是世界上没有永恒的金科玉律。原始可笑的思想也并非全无价值。没有幼稚的蓓蕾，又怎么可能有繁花似锦的满园春色呢？

作为一个耄耋老人，回想自己青年时的种种思想和向往，不免感到幼稚可笑而汗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其实，就在我此次重温自己以前的文字时，也每每不免感到某种尴尬，难以为情。但是不以自己真实的思想面貌示人，又怎么可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帮助和纠正，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提高呢？我希望尽可能如实地写出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从而尽可能地得到读者的反响和批评。

是为序。

何兆武

2009年初秋于北京清华园

目 录

学术道路

自 述 /3

联大师友杂记 /7

从思想史到历史哲学 /20

思想的苇草 /27

历史坐标的定位 /33

师友杂记

关于“清华学派” /43

也谈学衡派 /52

与陈寅恪先生相关的两件事 /62

历史学家的浪漫：纪念雷海宗先生 /68

回忆吴雨僧师片断 /73

有关张奚若先生 /83

有关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88

也谈顾颉刚先生（兼谈谢国桢先生） /94

怀念王浩 /97

记吕荧 /100

书边杂记

《寒柳堂诗》：袁翁与姪女 /109

读曹汝霖回忆录 /113

笔记与野史 /128

观历代帝王庙有感 /132

说“刘项原来不读书” /138

滚泥巴、书生、大红门 /141

杂忆北京师大附中 /147

原子、历史、伦理：读《费米传》书后 /152

重提一个老问题 /162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 /168

中学、西学与近代化 /176

关于诺贝尔奖情结 /186

问答通讯

与席文教授的通信 /191

致孙开太同志书 /196

与方光华先生的通信 /199

与侯旭东先生的通信 /202

谈理解历史 /206

《上学记》之后 /217



学术道路

自述^①

我原籍湖南岳阳，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就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9月全家间道南返故乡，在长沙入中央大学附属中学（由南京迁校）；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研究生。

毕业后，按时间顺序，我基本的简历如下：1946年至1949年任中国台湾“建国中学”、湖南第十一中学教师；1949年至1950年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毕业；1950年至1952年任北京图书馆编目员；1952年至1956年任西安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文化研究

① 本文原载于《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所教授。

其间，1980年任中美文化交流委员会中方访问美国学者；1984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鲁斯基金访问教授；1986年至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93年至1995年任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

我自己幼儿时正值军阀混战，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和后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仍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印象至今难忘。其后做小学生时又值“北伐”和“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后无日不在危城之中。上中学时，全民抗日战争爆发，随后是不断的颠沛流离。上大学时是“欧战”，继而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读研究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或许是由于自幼在古老的北京城里生活所培育的思古之幽情与连年战乱所引发的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感触和思索，使我选择了历史作为专业。

求学时期许多师友的启发，以及虽在战时却仍然相当丰富的图书与便利的阅读条件，容许我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难忘的时光。在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之时，却往往能得到精神上无比的启蒙之乐。当时的校园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它给了学生们很大的自由度，可以自由转系、自由旁听，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同学共同生活在一起。我自己曾前后转过四个系，曾旁听过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和“文学与人生”，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张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和“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刘文典先生的“温李诗”，冯至先生的“浮士德”，汤用彤先生的“大陆理性主义”和其他的课程与讲演。这些都不是我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同学好友中王浩和郑林生都曾对我的思想有过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专业我虽然一窍不通，但他们的谈话和思路每每给我以极大的启发。在专业上，噶邦福老师（I. J. Gapanovitch）则是引导我对历史哲学感兴趣的指路人。

新中国成立后，自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了侯外

庐先生领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班子，作为他的助手工作了30年。我认为侯先生的最大优点和特点是决不把思想史讲成是思想本身独立的历史，即不是从思想到思想，而是把思想首先当成是现实生活的产物，然后才是它从前人的思想储备库中汲取某些资料、方法和智慧。这本来也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原则之所在，即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然而20世纪60年代所风行的观点却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专门强调思想领先，把事情说成是思想在决定一切存在，历史是沿着思想所开辟的航道前进的。当时各种运动、劳动、社会活动和不务正业的各种业务接连不断，几乎占去了一个人绝大部分的时间，自己的专业也就无从谈起。

因为对西方思想史也感兴趣，所以不时也偷暇翻阅一些，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自留地”或是“地下工厂”的。偶然得到了哈布瓦赫（Halbwachs）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注释本。卢梭的书已是西方思想史上的经典著作，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曾大有影响，而居然没有一个可读的中译本，更不用说注释本。于是我又找来几种名家的注释本和沃恩（Vaughan）的权威本，除了翻译本文之外，还做了些集注的工作，多年来已前后修订过三次。

近代西方思想史，我以为实际上是两大主潮的互相颉颃：一条是由笛卡儿所开辟的“以脑思维”的路线；另一条是由帕斯卡所开辟的“以心思维”的路线。后一条路线并不违反科学，帕斯卡本人就是近代最杰出的数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但我国的研究者几乎从不提及帕斯卡的名字。我恰好有一本布伦茨威格（Brunschvicg）的帕斯卡权威本，所以又偷译了他的《思想录》，并找了几种注释本，也做了一点集注和诠释的工作。在我感兴趣的历史哲学领域，我以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一书，迄今仍不失为西方最深刻、最有价值的著作，所以在20世纪60、70年代把它译了出来。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时间较多，研究环境也较前宽松，几次出国，也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未能见到的书和材料，于是又动手翻译了几部书，

也写了一些文章。文章大多已收入自己的书中和文集中。

近代中国较近代西方落后了一步，所以 19 世纪、20 世纪的中国还在补西方 18 世纪、19 世纪的课。把历史学认同于科学，就是在思想上补 19 世纪实证主义的课。我以为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所以它必须服从科学而不能违反科学），又有非科学的一面（所以就不能以实验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要求为尽历史学之能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历史学（和人文学科）还另有其自己独特的纪律、规范和准绳（criterion）。我希望有人能把它写出来，我自己也愿意做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活动，所以研究人性运动的轨迹（即历史）就是历史学的当然任务。人性当然包括阶级性在内，但阶级性并不能穷尽人性。善意固然是人性，恶意也是人性。“文革”对于其他专业工作者未免是一种损失，使他们失去了大量宝贵的钻研时间；但是唯独对于文科来说（如历史学、哲学、文学等），它却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得我们有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到人性的深处。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和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迸发出来。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这样空前的优异条件写出一部或若干部的中国史、世界史以及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历史哲学的书来，那就未免太辜负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了。

联大师友杂记^①

由幼年到青年时期，正值从“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事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天的岁月，人类的命运、历史的前途等问题深深吸引了自己，所以终于选择了历史作为专业。不久又对理论感兴趣，觉得凡是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就不能称为学问；于是可走的路似乎就只有两条，一是理论的历史；二是历史的理论。其实，刚入大学的青年，对任何专业的性质，根本就谈不上有任何理解。

当时教中国通史的是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就是他讲课的讲稿。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听者为之动容。据说19世纪末特赖奇克（Treischke）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经常吸引大量的听众，对德国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起了

① 本文原载于《历史理性批判散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很大的鼓舞作用。我的想象里，或许钱先生讲课庶几近之。据说抗战前，钱先生和胡适、陶希圣在北大讲课都是吸引了大批听众的，虽然这个盛况我因尚是个中学生，未能目睹。钱先生讲史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加之以他所特有的激情，常常确实是很动人的。不过，我听后总感到他的一些基本论点令我难以折服，主要是因为我以为他那些论点缺乏一番必要的逻辑洗练。至今我只记得，他发挥民主的精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其精神而不在于其形式，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陈寅恪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术泰斗，使我们初入茅庐（西南联大的校舍是茅草盖的）的新人（freshman）也禁不住要去旁听，一仰风采。陈先生开的是高年级的专业课，新人还没有资格选课。陈先生经常身着一袭布长衫，望之如一位恂恂然的学者，一点看不出是曾经喝过一二十年洋墨水的人。陈先生授课总是携一布包的书，随时翻检；但他引用材料时却从不真正查阅书籍，都是脱口而出，历历如数家珍。当时虽然震于先生之名，其实对先生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读过。翌年先生去香港后（本是取道香港去英国牛津大学讲学的，因战局滞留香港），我才开始读到先生的著作。当然，先生的学问，我只有望洋兴叹，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我却时常不免感到，越是读它，就越觉得从其中所引证的材料往往得不出来他那些重要的理论观点。这引导我认为，历史学家的理论并不是从史料或史实之中推导出来的，反倒是历史学家事先所强加于史实之上的前提；也可以说，历史学家乃是人文（历史）世界真正的立法者。或者，用20世纪60年代的术语来表达，即是说历史研究事实上并非是“论从史出”，而是“史从论出”。陈先生自称是“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就典型地代表着新旧文化交替方生方死之际一个学人的矛盾心情；他似乎毕生都在把自己惋时抚事的感伤寄情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这样就使他的历史观点也像他的诗歌一样，浓厚地染上了一层他自己内心那种感慨深沉的色调。一个人的思想和理论，毕竟首先而且

根本上乃是时代现实的产物，而不是前人著作的产物。

陈先生上课堂带书，是备而不用，而雷海宗先生上课则是从不带片纸只字。雷先生从来不看讲稿，他根本就没有稿子，一切的内容都在他的满腹学问之中。我曾整整上过他三门课，我想大概任何一个上过他的课的人都不能不钦佩他对史事记得那么娴熟。那么多的年代、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和事件，他都随口背诵如流。三年之中我记得他只有两次记忆略有不足，一次是他把《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说成迪安·斯威夫特（Dean Swift）；另一次是一个波兰人的名字他一时没有想起，不过迟疑了一下，马上就想起来了。雷先生有他自己一套完整的历史理论，脱胎于斯宾格勒，而加以自己的改造。其中主要的一点是他认为每种文化都只有一个生命周期，只有中国文化有两个周期——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假如那场战争失败了，中国就极可能会像古罗马文明一样地破灭，而让位给别族去开创新的历史和新的文化了——他展望着中国历史还会有第三个周期。

1939年秋的一个夜晚，林同济先生在西南联大昆中南院南天一柱大教室作了一次公开讲演——“战国时代的重演”。当场座无虚席，林先生口才也确实是好，全场情绪活跃而热烈。讲完后，大家纷纷提问。记得有一位同学问道，马克思认为历史将由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重演论”对此如何评论？林先生回答说：马克思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聪明人的话不一定是正确的，马克思是根据他当时的认识这样说的。此后不久，就在林先生（以及雷先生）的主持下出版了《战国策》杂志。就我所知，当时国外风行一时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也是由他们这时介绍进来的，雷先生还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大地政治、海洋政治和天空政治”。新中国成立后，战国策派被批判为法西斯理论，其实当时即已有不少人（包括右派）是这样批判它的了。有一次讲演中林先生公开答辩说：有人说我林同济是法西斯，我会是法西斯吗？那次讲演他的

大意是说（事隔多年，已记不太清楚，大意或许如此）：古今中外的政治，总是少数领导多数；他是赞成这种意义上的贵族制的。观乎当时英国工党左翼领袖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来华在昆明讲演公开抨击当政的张伯伦政府，而那次讲演是由林先生作翻译的^①；又，新加坡失守后，林先生以公孙震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论文《新加坡失守以后的盟国战略问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林先生欧游的通讯（也载在《大公报》上）；法西斯这顶帽子似乎对于林先生并不见得十分合适。即以文化形态学的代表斯宾格勒（汤因比的著作当时尚未完成）而论，也曾被人批为法西斯的理论先驱，其实希特勒要建立的是一个唯我独尊的第三帝国，而斯宾格勒却在宣称西方的没落，也并不很投合纳粹党的胃口。

1941年春，雷海宗先生在云南大学作了一次公开讲演，系统地阐发了他的文化形态史观；讲完以后，主席林同济先生称赞这个理论是一场“历史家的浪漫”（他的原文是 the romance of a historian）。我承认作为一种传奇（romance）来看待，这个理论确实颇为恢宏壮丽、引人入胜（尤其是它那宏伟的视野和深层的探索）；但生物学的方法毕竟不是科学的唯一的方法，更不是历史学的方法。何况雷先生对年代数字的神秘性之入迷，几于达到刘伯温式推背图的地步（这一点他在讲课中也经常流露出来）。普遍存在的东西，并不能径直被认同为充分理由。万有引力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在没有人的沙漠里，万有引力也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毕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用万有引力就可以充分说明人文的历史。林黛玉伤心时流下眼泪，她的眼泪是朝下流，并不朝上流，这是万有引力在起作用，但用万有引力定律并不能解说林黛玉的多情和感伤。不但物理的

^① 林先生是政治学家，他当然知道克氏的立场和态度，倒是我们这些青年听到一位有名望的公民，居然在战时可以公开向外国人抨击本国的战时政府和领袖（张伯伦当时尚是首相），对英国政治制度有了一些直接的感受。多年以后，我在美国两次遇到大选，双方也是相互猛烈攻击对方的领袖。